

● 汉语言文字研究

特约主持人：曹 炜

主持人按语：本期栏目共刊发三篇文章。吴福祥教授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对语义演变的动因作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了我国极为丰富却较少被利用的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料，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提倡的。俞理明教授对词汇的分层及其外围成分进行了讨论，虽然说的是汉语，但对别的语言的词汇系统的划分也同样适用。汉语词汇学界向来对词汇系统的分类存在分歧，新生词、古语词、方言词、行业词、外来词等术语常常困扰着我们，让我们无所适从：这些术语究竟是按照怎样的分类原则被放置在同一平面的？若不放置在同一平面又该如何处理？俞理明教授给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此外，考虑到构式语法目前正是汉语语法学界的热门话题，也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前沿问题，陈满华教授这篇讨论构式语法起源、发展的文章将会对国内方兴未艾的构式语法研究提供学术背景和理论基础，因此也一并放在本栏刊发。这三篇文章虽然研究的领域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均具有浓郁的理论色彩，均具有方法论意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相信这些带有作者独特视角、独立思考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述会给大家在汉语言文字的研究过程中带来灵感和启迪。

语言接触与语义复制

——关于接触引发的语义演变

吴 福 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语义演变的过程更类似于“牛生犊”而非“蚕化蛾”。研究语义演变主要有语义衍生学和概念定名学两种视角。语言接触是引发语义演变的重要因素。语义复制有两种模式，即“同音复制”和“多义复制”；此外，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可被视为“多义复制”的一个特别的次类。

关键词：语义复制；语义演变；语义衍生学；概念定名学

作者简介：吴福祥（1959—），男，安徽安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历史语义演变的专题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740014）的阶段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4)01-0113-07 收稿日期：2013-10-13

语义演变是语言演变的重要方面,也是历史语言学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以往的语义演变研究虽然有很多重要成果问世,但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学界的讨论并不很充分,意见也未完全取得一致,比如“什么是语义演变”,“语言形式如何获得新义”,“语义演变的动因有哪些”,等等。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接触引发的语义演变,同时也对上述问题略作探讨。

一、关于语义演变

(一)什么是语义演变

什么是“语义演变”?简单的回答是:“语言形式的意义(meaning)所发生的任何演变,通常也包括语法语素的语法功能所发生的演变。”^{[1]303}不过,“语义演变”到底是指什么样的历时过程,语言学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传统的看法是,语义演变指的是一个意义在不同时间层面所发生的实际变化,也就是说,源义M1自动变为新义M2。这种看法可以被称作“意义直接改变(immediate mutation)”观。比如 Jeffers 和 Lehiste 就将语义演变界定为“一个词所能出现的语境发生了改变”(a change in the set of contexts in which a given word might occur)^{[2]362},因为 Jeffers 和 Lehiste 将“意义”(meaning)理解为“一个词所能出现的语境”(the set of contexts in which a given word might occur),所以很明显,他们对语义演变的上述定义,清楚地隐含着“源义M1自动变为新义M2”这种主张。持类似语义演变观的学者还有 Matisoff,他将语义演变(semantic shift)定义为:“给定一个词源成分(etymon)E,如果它在该语言的某个历史阶段,即S1,表达的意义是‘M1而非M2’,而在该语言后来的某个历史阶段,即S2,表达的是‘M2而非M1’;那么,这个语源成分E在意义上发生了改变。”^{[3]173}很显然,这种“意义直接改变(immediate mutation)”所界定的语义演变过程,跟王力所说的语义演变的“如蚕化蛾”模式^[4]并无二致。

Wilkins 用图1来刻画上述语义演变观:

时间(T):	T1	T2
形式(F):	F1	F1
意义(M):	M1	→ M2

图1 语义演变的“直接改变”观^{[5]268}

正如 Wilkins 所正确指出的,这种语义演变观(语义的直接改变)最大的问题是,它隐含了这样一个断言:意义M1和M2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

共存。^{[5]268}换言之,语言中意义1和意义2不会以多义模式共存于一个形式。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语言(以及一种语言的任何阶段)都广泛存在多义模式。

其实,有些语言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这种“意义直接改变”观的缺陷。王力于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明确指出:“词义的转化不一定是新旧的代替,也就是说原始意义不一定因为有了引申义而被消灭掉。有时候,它们的新旧两种意义是同时存在过,或至今仍是同时存在。因此我们知道词义的转移共有两种情形:一种如蚕化蛾,一种如牛生犊。”^{[4]572}此外, Jakobson 也主张:“任何一个演变过程的开始阶段和完成阶段都会共存于语言的共时系统,均属于同一种语言的两个不同的子码。因此,我们在理解和解释任何一个演变时不能不考虑演变成分所在的特定系统以及该演变成分在这个系统中的功能。”^{[6]22-23}

跟 Jeffers 和 Lehiste 等学者所持的“语义直接改变”观不同, Wilkins 主张,语义演变指的是义项的增加(添加新义)或消失(丢失旧义),而非某个义项本身的改变。这种看法我们谓之“多义模式”观。代表性观点见于 Wilkins 的论述:“语义演变指的是不是意义本身的改变,而是一个语言成分在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其语义系统增加了新的意义或丧失了原有的意义。重要的是,言语社会中所有语义演变在其开始或最后阶段都涉及多义关系(polysemy)。基于这种观点,一个单一的语义演变实际包含了两种语义演变:第一种语义演变是通过意义的增加而导致多义模式的产生,第二种语义演变则是通过原有意义的丧失而消除上述多义模式。共时的多义模式在语义演变研究中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种多义模式为两个义项在语义上互相关联以及一个义项引发另一个义项出现这样的假设提供了重要证据。”^{[5]269}

Wilkins 用图2来刻画语义演变的“多义模式”观。

时间(T):	T1	T2	T3
形式(F):	F1	F1	F1
意义(M):	M1	→ M1 & M2	→ M2
特征:	p, q, r	p, q, r, q, r, s	q, r, s

图2 语义演变的“多义模式”观^{[5]269}

与 Wilkins 的主张极为相近的是 Kearns,后者认为语义演变本质上体现为(1)所示的两个过程^{[7]1}:

(1) 语义演变的两个过程：

a. $Fa > Fa, b$ [具有意义 a 的语言形式 F 获得了另外的意义 b]

b. $Fa, b > Fb$ [具有意义 a 和 b 的语言形式 F 丢失了意义 a]

Kearns 指出, 既然过程 (b) 作用的是一个多义形式 (Fa, b), 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多义形式是过程 (a) 的产物, 那么过程 (b) 的发生一定依赖于过程 (a), 而反之则不然。^{[7]11} 由此可见, 语言成分意义获得的过程是语义演变的必要条件。

尽管语义演变指涉的是意义的产生和意义的丧失两个方面, 但历史语言学家对语义演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意义的产生而非意义的丧失, 而且迄今有关语义演变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也主要关涉意义的产生。这是因为, 第一, 语言成分意义的丧失通常是混乱无序、没有规律性的, 因而无法预测; 反之, 意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理有据、有规律可循的, 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第二, 意义消失的过程通常是以新义产生为前提, 而反之则不然。因此, 意义的产生是语义演变的核心所在。

(二) 词项是如何获得新义的

Geeraerts 认为, 语义演变研究要着重考虑以下三个问题^[8]：

() 给定一个词项 L, 其意义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

() 给定一个概念结构 C 或者意义 M, 它用什么样的词项来表达?

() 给定一个概念结构 C, 它经由什么样的语义演变路径变为或源自其他概念结构 Cs?

问题 () 的研究通常是语义衍生学 (semasiology) 取向, 即聚焦于一个成分在形式不变的前提下所发生的意义变化, 特别关注多义词的产生。问题 () 的研究则是典型的概念定名学 (onomasiology) 取向, 即聚焦于特定概念域 (如颜色域) 编码形式的演变或重组 (restructuring), 关注的是概念结构 C 的词汇表达式在不同时间层面的变化。问题 () 的研究是以演变规律为目标, 即以问题 () 和 () 的研究为基础, 着重于跨概念结构语义演变的模式、规律及机制的研究。

很多语言学家^[8-12]认为, 语义衍生学和概念定名学是研究语义演变 (尤其意义产生) 的两种主要研究方法 (approach) 或视角 (perspective)。语义衍生学着眼于形式到功能的映射 (从语言符

号到现实世界), 关注的是一个给定的词项如何获得新的意义; 与之相反, 概念定名学着眼于功能到形式的映射 (从现实世界到语言符号), 关注的是一个给定的概念如何获得新的名称或说话人如何为一个给定的概念找到新的表达形式。^{[9]25-26} Traugott 和 Dasher 分别用图 3 和图 4 来刻画上述两种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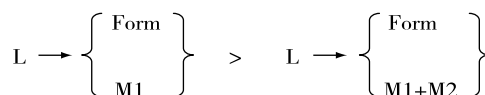


图3 语义衍生学视角^{[9]25}



图4 概念定名学视角^{[9]26}

Blank 用图 5 来描述概念定名学和语义衍生学这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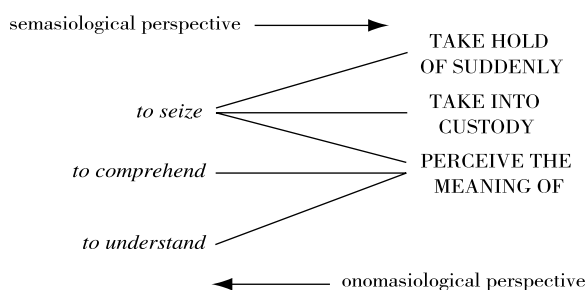


图5 语义衍生学和概念定名学^{[10]38}

从语义衍生学角度来说, 我们要考察一个形式 (词) 具有哪些不同的意义, 比如英语动词 *seize* 的多义模式; 而从概念定名学角度来说, 我们需要给 *PERCEIVE THE MEANING OF* 等概念进行定名。历时层面上, 语义衍生学的研究方法是描述特定词语的语义演变和发展, 比如要说明英语动词 *seize* 历史上如何获得 “to take into custody” 这种转喻性意义以及 “to understand” 这种隐喻性意义。另一方面, 概念定名学则聚焦于概念编码方式的演变, 比如要说明, *PERCEIVE THE MEANING OF* 这个概念在英语历史上采用哪些不同的编码形式, 其编码过程中词汇演变的路径是什么, 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 概念定名学的研究模式虽然重在探讨概念编码形式的产生和演变, 但也涉及特定词项意义的增加以及该词项语义系统的改

变。譬如,随着计算机的使用和普及,人类的概念系统里出现了一些与计算机有关的新概念。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是“计算机程序中出现在显示屏上的各种命令名称的选项列表”,这个概念在英语里已被命名为“menu(菜单)”。如(2)所示,这种概念定名的结果是“menu”这个词项获得了一种新的“隐喻”义。

(2) menu(菜单):

概念	意义1: 餐馆提供的列有各种菜肴名称的清单
定名	意义2: 计算机程序运行中出现在显示屏上的各种命令名称的选项列表
新概念	计算机程序中出现在显示屏上的各种命令名称的选项列表

二、语义复制及其类型

以往的语义演变研究,关注较多的是认知操作和语用因素如何引发特定语言的语义演变(新义的产生)。特别是与语法化相关的语义演变研究,借鉴认知语义学和历史语用学的方法和成果,运用普遍适用的认知模式和语用原则来探讨语义演变的动因、机制和模式,概括和总结出很多重要的语义演变的模型和理论框架。比如 Sweetser 的“历时隐喻模型”^[13](Diachronic metaphor model)、Geeraerts 的“历时原型语义学”^[8](Diachronic prototype semantics)、Heine 的“转喻—隐喻模型”^[14-16](Metonymic-metaphorical model)和 Traugott 的“语义演变的诱使性推理理论”^[9, 17-18](Invited inferencing theory of semantic change)。不过,近些年来,随着接触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发现,除了认知、语用等因素外,语言接触也是引发语义演变(特别是新义产生)的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接触引发的语义演变主要有语义借用和语义复制(semantic replication)两种类型。语义借用含词汇借用和语法借用两个子集,指的是受语从源语中引入实际语素(音—义单位);语义复制则含词汇复制和语法复制两个子集,指的是复制语复制了模式语的语义概念、语义模式或语义演变过程。下面我们着重讨论语义复制的几种类型。

(一) 同音复制

同音复制是指复制语的使用者对模式语中某个同音模式的复制,从而导致复制语中出现与模式语相同的同音模式。这种语义复制的典型情形

是:复制语的使用者注意到,模式语里有一个词形(同音词)H具有x、y两个意义(即H[x,y]),于是他们利用自己语言里与Hx对应的语素Dx,产生出与Hy对应的意义Dy,从而复制了模式语的同音模式D[x,y],如(3)。

(3) 模式语 复制语

$H(x,y) \rightarrow D(x,y) \{ \text{条件: } Dx=Hx \}$

例如,在中国青海东南部(黄南藏族自治州)和甘肃西南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毗邻地区,安多藏语、东乡语、撒拉语、保安语、回民汉语以及五屯话一直处于密切接触之中,由此导致该地区语言发生大量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比如,在保安语中表达数目“万”(=“十千”)这个概念的词是 ajɕə:

(4) /nəgɔ ajɕə/ “十千”(即“万”)

一 十千

/ɕuag ajɕə/ “二万”

二 十千

/ɕurɔŋ ajɕə/ “三万”

三 十千

/derɔŋ ajɕə/ “四万”

四 十千

但 ajɕə 在保安语中也有“碗”的意思,例如:

(5) nəgɔ ajɕə jamu “一碗面条”

一 碗 面条

“碗”和“万”(十千)在概念上几无联系,因此二者不大可能有演变关系。基于下述证据,李讷认为,保安语 ajɕə 的“万”这个意义是受当地回民汉语影响而产生的。^{[19] 325-337}

第一,保安语原先没有专门表达语义概念“万”(“十千”)的语素,ajɕə 的“万”这个意义是跟回民汉语接触之后才出现的。另一方面,当地的回民汉语原先就有表达语义概念“万”的语素 /wan/。

第二,当地回民汉语里, /wan/ “万”这个语素跟语素“碗”语音形式相同,即 /wan/ 有两个意义:“碗”(bowl)和“万”(ten-thousand)。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安语的使用者并非

“词汇借用”和“语法借用”的区别是:前者借用的是词汇成分(即实词),后者借用的是语法成分(即虚词和词缀)。因为词汇借用和语法借用涉及“音—义单位”整体性迁移,故属于“语义借用”。

“词汇复制”和“语法复制”的区别是:前者复制的是词汇意义(词汇概念),后者复制的是语法意义(语法概念)。因为词汇复制和语法复制只涉及语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迁移,故属于“语义复制”。

直接从回民汉语中借入 /wan/ ,而是仿照回民汉语“碗”(bowl)和“万”(ten-thousand)的同音模式(homophony),给其本土词汇 /ajɤ́/“碗”(bowl)增加了“万”(ten-thousand)的意义,从而复制了回民汉语 /wan/ 的同音模式。我们将这个接触引发的语义演变重建如下:

(6)在与回民汉语的接触中,保安语使用者发现“万”这个语义概念在语言交际中的必要性。不是直接借用回民汉语的语素 /wan/“万”,保安语的使用者通过赋予其本土词语 /ajɤ́/ 与回民汉语 /wan/ 相同的两个意义,从而复制了回民汉语表达“碗”和“万”的语素的同音模式。由此,保安语 /ajɤ́/“碗”一词获得“万”这个新的意义(即经历了语义演变)。

(二)多义复制

跟同音复制不同,多义复制是指复制语的使用者对模式语中某个多义模式的复制,从而导致复制语中出现与模式语相同的多义模式。这种语义复制的典型情形是:复制语的使用者注意到,模式语里有一个词项(多义词)S具有x、y两个意义(即S[x,y]),于是他们利用自己语言里与Sx对应的语素Lx,产生出与Sy对应的意义Ly,从而复制了模式语的多义模式S[x,y],即

(7) 模式语 复制语

$$S(x,y) \rightarrow L(x,y) \quad \{\text{条件: } Lx = Sx\}$$

例如汉语的“出彩虹”在倒话里要说成“gɔ̃³²⁴ tɕʰ⁵⁵⁴”。这里的“gɔ̃³²⁴”就是汉语“虹”在倒话中的读音,而“tɕʰ⁵⁵⁴”其实就是汉语的“伸”字,亦即“出彩虹”说成“虹伸”。动词后置于宾语,是倒话语法与藏语语法一致的地方,这里姑且不论;问题是为什么表示“出彩虹”动词要用“伸”呢?这从汉语中很难解释,不过,若从相应的意义内容在当地藏语中的表达方式这个角度来看,便豁然开朗了:当地藏语“出彩虹”的说法是“vdzav rkjang[ndzɤ́³⁵ tɕiɔ̃⁵⁵]”,“vdzav”即“虹”的意思,而“rkjang”就是“伸展”的意思。同时,当地藏语说“展开双手(臂)”时,也用“rkjang”。与此对应,倒话在“展开双手(臂)”和“出彩虹”时都用“tɕʰ⁵⁵⁴”(伸)字来表示。^[20-22]也就是说,倒话的“tɕʰ⁵⁵⁴”(伸)之所以具有“显现(彩虹)”的意思,是因为这个倒话词汇复制了藏语对应词“rkjang”的“展开—显现”这一多义模式,如(8)所示:

(8) 模式语 复制语

(藏语) (倒话)

$$S(x,y) \rightarrow L(x,y) \quad \{\text{条件: } Lx = Sx\}$$

rkjang(展开;显现) tɕʰ⁵⁵⁴(展开;显现)

(三)接触引发的语法化

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是指一个语言受另一个语言影响而发生的语法化过程。^{[23]193, [24]533}因为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主要涉及复制语相关语言成分的语义演变,所以可被视为语义复制(多义复制)的一个特别的子类。

现代汉语“了”除用作完整体(perfective)助词(即“了1”)和完成体(perfect)助词(即“了2”)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用法,其多功能模式大体可概括如下:

(9)a.“完毕”义动词:这事儿已了(liao³)啦。

b.结果或动相补语:这些菜我吃不啦(liao³)啦。

c.能性傀儡补语:明天的活动我参加不了(liao³)。

d.完整体助词(即“了1”):吃了(le⁰)饭再去吧。

e.完成体助词(即“了2”):他同意我去了(le⁰)。

无独有偶,汉语“了”的这种多功能模式也见于回辉话^[25]的“完毕”义语素“phi⁵⁵”。例如:

(10)a.“完毕”义动词:phi⁵⁵:完(做完了)

(附录一:“词汇材料”,199页)

b.结果补语/动相补语:

nau³³ nau²⁴ phi⁵⁵.

他 做 完了

他做完了。(96)

nau³³ sa³³ sien¹¹ lu³³ hu³³ zao²⁴ pu³³ phi⁵⁵.

他 的 钱 多 得 数 不 完 了

他的钱多得数不完。(97)

c.能性傀儡补语

/a¹¹kai³³ hau³³ hu³³ pha⁴³ pu³³ phi⁵⁵.

老 人 累 得 走 不 了

老人累得走不动。(86)

d.完整体助词:

pia³³ phi⁵⁵ ta¹¹ mau¹¹ ko⁵⁵ saŋ³³.

种 了 一 亩 花 生

种了一亩花生。(88)

kau³³ kia⁴³ huai³² phi⁵⁵ kia⁵⁵ zai³³ lo³³.

我 等 白 了 半 天 了

我白等了半天了。(83)

这里的“吃不了”是“吃不完”的意思,“了”是“完”义的结果/动相补语。

“能性傀儡补语”(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这个术语是赵元任(1968)最早提出的。赵先生说:“有两个常用的补语‘了’(liao)和‘来’,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作用在于使可能式成为可能,是一种傀儡补语。”见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e. 完成体助词：

/a¹¹pa³³ kau³³ na³²ŋ⁵⁵ piu⁵⁵ ma³³ thun³³ phi⁵⁵.

父亲 我 六 十 五 岁 了

我父亲六十五岁了。(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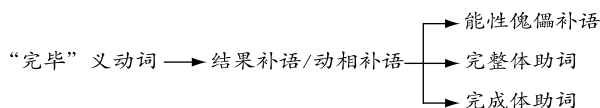
na²⁴sa³²ŋ³² tha¹¹ŋ²⁴za³²i³² phi⁵⁵.

小孩 站 起来 了

小孩站起来了。(74)

回辉话 phi⁵⁵ 和汉语“了”共时多功能模式的一致性无疑源自这两个语素历时演变路径的相似性。我曾根据共时模式和历时文献等方面的证据,将回辉话 phi⁵⁵ 和汉语“了”的“多向语法化”(polygrammaticalization)路径构拟如下^[23]：

(11) 汉语“了”和回辉话 phi⁵⁵ 的多向语法化路径：



回辉话 phi⁵⁵ 的语法化路径之所以同于汉语“了”,是因为前者(phi⁵⁵)复制了后者(“了”)的语法化路径。^[23]其证据主要有二。

第一,越南境内跟回辉话同属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Malayo-Polynesian)占语支(Chamic)的语言,如拉德语(Rade)、罗格莱语(Roglai)以及藩朗占语(Phan Rang Cham),其“完毕”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迥异于回辉话的 phi⁵⁵,如藩朗占语的 pləh。

(12) 藩朗占语 pləh 的用法^[26]：

a. 主要动词：“完毕”(‘finish’)

b. 小句或句子连词(用于小句之首,引出后续事件),相当于汉语的“然后”：

pləh mi? kədəh məkya nam patəw?
finish get peel ebony that hi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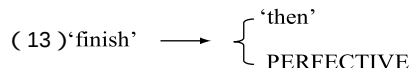
‘then took the skin of the fruit and hid it.’

c. 表示一个事件或活动在另一事件或活动之前结束或完成(用于所在小句之末)：

rəmi? məŋin cəlu? pləh ŋu pə lithay naaw pa? piŋ...
clean bowl plate finish she take rice go at well

‘After she did the dishes, she took the rice to the well ...’

可见,藩朗占语 pləh 的语义演变路径^[26]应是：



第二,回辉话跟汉语的接触已有数百年的历史,长期密切的语言接触导致回辉话在语音、词汇、形态和句法方面受到汉语广泛、深刻的影响^[26-29],以至 Thurgood 和 Li 断言,这个语言已由南岛语变成了汉语的一种方言。^[29]

三、结语

本文讨论语义演变及其接触动因,着重以中国境内语言的事实为例,探讨接触引发的语义复制。初步的结论是：

第一,语义演变的过程更类如“牛生犊”而非“蚕化蛾”；

第二,研究语义演变(特别是新义产生)主要有“语义衍生学”和“概念定名学”两种视角；

第三,语义演变既有语用—认知因素,也有语言接触的动因；

第四,语义复制有“同音复制”和“多义复制”两种模式；此外,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也可视为语义复制(多义复制)的一个特别的次类。

(作者由衷感谢马贝加教授和曹炜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 [1] Trask R L. The Dictionary of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M]. Edinburg : 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 , 2000.
- [2] Jeffers Robert J , Ilse Lehist.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M].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 and London : MIT Press , 1979.
- [3] Matisoff J A. Variational Semantics in Tibeto-Burman : The ‘organic’ Approach to Linguistic Comparison[M]. Philadelphia :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 1978.
- [4] 王力. 汉语史稿 : 下册[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0.
- [5] Wilkins David P. Natural Tendencies of Semantic Change and the Search for Cognates[G]//Mark Durie , Malcolm Ros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Reviewed : Regularity and Irregularity in Language Change. New York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6] Jakobson Roman. Main Trends i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M]. London : George Allen & Unwin , 1973.
- [7] Kearns Kate. Implicature and Language Change[G]//Jef Verschueren , Jan-Ola Östman , Jan Blommaert , Chris

- Bulcaen. Handbook of Pragmatics :2000 Installment. Amsterdamam :John Benjamins ,2002.
- [8]Geeraerts ,Dirk. Diachronic Prototype Semantics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Lexicolog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9]Traugott Elizabeth C. Richard Dasher.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0]Blank Andreas. Words and Concepts in time :Towards Diachronic Cognitive Onomasiology[G]//Regine Eckardt ,Klaus von Heusinger ,Christoph Schwarze. Words in Time :Diachronic Semantics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3.
- [11]Lehmann Christian.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Methods in Linguistics(ms. X Z].University of Erfurt ,2003-12-29.
- [12]Koch Peter. Cognitive Aspects of Semantic Change and Polysemy :the Semantic Space HAVE/BE[G]//Blank ,Koch.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9.
- [13]Sweetser Eve 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4]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Friederike Hünemeyer.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15]Heine Bernd. Auxiliaries :Cognitive Forc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M].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6]Heine Bernd. Possession :Cognitive Sources ,Forc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7]Traugott Elizabeth C. The Role of Pragmatics in Semantic Change[G]//Jef Verschueren. Pragmatics in 1998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6th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 ,vol. II. Antwerp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1999.
- [18]Traugott Elizabeth C. The Rhetoric of Counter-expect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a Study in Subjectification[G]//Blank ,Koch.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9.
- [19]Li Charles N. Contact-induced Semantic Change and Innovation[G]//Jacek Fisiak. Historical Semantics ,Historical Word-formation. Berlin ,New York ,Amsterdam :Mouton Publishers ,1985.
- [20]阿错·意西微萨.雅江“倒话”的混合特征[J].民族语文 ,2002 ,(5).
- [21]阿错·意西微萨.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混合与语言接触研究[D].天津 :南开大学 ,2003.
- [22]阿错·意西微萨.倒话研究[M].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 [23]吴福祥.南方民族语言里若干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过程[G]//吴福祥,崔希亮.语法化与语法研究 :四.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24]Heine Bernd ,Tania Kuteva.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J]. Studies in Language ,2003 ,27.
- [25]郑贻青.回辉话研究[M].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 [26]Thurgood Graham. Sociolinguistics and Contact-induced Language Change :Hainan Cham ,Anong ,and Phan Rang Cham[C].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17-20 January 2006 ,Puerto Princesa City ,Palawan ,Philippines.
- [27]Thurgood Graham.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Two Thousand Year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Change. Oceanic Linguistic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 [28]Thurgood Graham and Fengxiang Li. Contact Induced Variation and Syntactic Change in the Tsat of Hainan.[G]//David Bradley ,Randy LaPolla ,Boyd Michailovsky ,Graham Thurgood.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Pacific Linguistic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3.
- [29]Thurgood Graham ,Fengxiang Li. From Malayic to Sinitic :The Restructuring of Tsat[Hainan Cham]under Intense Cotect[G]//Ratree Wayland ,John Hartman ,Paul Sidwell. SEALS XII :Papers from the 12th Meeting of the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Society(2002).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2007.

[责任编辑 :雨 夕]